

马二红学

MA ER HONG XUE

杨乃济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 闲聊丛书 ❧

马二红学

杨乃济 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二红学/杨乃济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马… II. 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34 号

书名	闲聊丛书——马二红学
作者	杨乃济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 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稷下学宫，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燭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遒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句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自序

或许由来于某种历史的误会，我的名字前面也常冠以“红学家”的徽号，究其实不过一介红学票友而已，哪里称得起什么家呢。而且，要按票友一词诞生时的原义——他必须持有一张官方发给的“龙票”的话，我就连票友资格也不够，只是玩票的这个“玩”字，还研习得不差。

我一向很看重“玩”，认为“玩”中有三昧。因此，在我为王世襄先生的煌煌巨著《明式家具研究》写的一篇书评中说：

“‘做’与‘玩’的区别似乎人人都懂，又似乎未必懂。做学问往往先有一个预定的目标，或为完成领导上分配的任务，或应出版社的稿约，或为研究而研究，为写作而写作；而玩学问总是受爱好和乐趣的驱使，一切都起源于这个‘玩’字上。它原无预期的目的，划好的框框，既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也无成败得失的臧否喜忧。成固欣然，失亦不会受到斥责。为了玩得痛快，一切思想自然是解放得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再看其结果，做学问者虽大多数玩

得极其潇洒，最后只玩出一个穷而后光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一旦玩出名堂来，却是特号的卫星上天！

……历史上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品，如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石涛的画，曹雪芹的《红楼梦》，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无一不是玩出来的。世襄先生近年的一大批著作，如《竹刻艺术》、《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北京鸽哨》，以及目前正写得津津有味的《葫芦器》，又有哪一项不是玩出来的呢？”

当然，以上列举的几位，都是“玩出名堂来”的大家，像我这样“只玩出一个穷而后光”的，绝不能与此辈大家混迹于一类。至于我所结识的红学界的朋友们，竟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玩票客”；他们或在大学中文系任教，或在做专业的文学（红学）研究，比比皆由文学步入红学。而我呢？学的是建筑，目前在旅游教育界供职，兴趣爱好又一任其游荡于五花八门飘忽不定，套用一个病理学言称癌症晚期病灶扩散的术语，就是我的兴趣热点也像癌症病灶一样“呈游走性的转移”，我在红学领域时不时玩上一票，只不过是来去游走中的一站而矣。

记得知堂先生在《谈龙集》《谈虎集》序中，谈到这两本集子的命名时说：

“书名为什么叫做谈虎与谈龙，这有什么意思呢？……据说从前有一位叶公，很喜欢龙，弄得一屋子里尽是雕龙画龙，等得真龙下降，他反吓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话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但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所谈的压根就是假龙，不过姑妄谈之，并不想请他来下雨，或是得一块的龙涎香。……

……我本不是什么御史或监察委员，既无官守，亦无言责，何必来此多嘴，自取烦恼。我只是喜欢讲话，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对于许多不相干的事情，随便批评或注释几句，结果便是这一大堆稿子。……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

我在红学领域的玩票，与知堂先生的谈龙谈虎颇有几分相似，我之所玩，压根就是类乎假龙的非正宗红学，并一如知堂先生的既不求雨也不求得龙涎香，从来就不存以红学为赢得实惠的手段，所以今天连个红学会会员也不是。不过常年都写点红学文字，不断地与人争鸣惹

人恼怒而矣。

怪就怪在红学这一界自打曹雪芹先生著书山村落魄而死后，但凡“沾点红”的货色都能沽得好价钱，于是乎卖老的、卖少的、卖村的、卖俏的、卖神的、卖怪的、卖酒的、卖菜的……，一一都拖上个大大的“红”招牌，竟将偌大一个红坛闹成一个买卖兴隆的大集市。不过再一想，身为票友的我原无洒扫红坛的职责，看到种种怪事，本当见怪不怪。

知堂先生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从前上谕常云，知道了，钦此。知道了那么这事情就完了，再有话说，即是废话。”如此则我这十二篇旧作辑成的集子的最确切的命名，就应该是《废话集》或《红楼废话》了，但既是废话又要出书似与常理相悖，还是改个名字为好，于是再三搜索枯肠，遂将这一册定为《马二红学》。何谓“马二红学”呢？那就是马二先生写下的红学文章。正像知堂先生在《我的杂学》引言注中说的：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后来多还记得，特别是关于批评马二先生的话。……‘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圈也被他批坏

了。’这里所谓文章是说八股文，杂学是普通诗文。马二先生的事情本来与我水米无干，但是我看了总有所感，仿佛觉得这正是说着我似的。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用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

马二先生的好读书又不尚举业与知堂先生的没有专门职业只喜欢涉猎闲书，与我这个红学票友都很相似，虽说写过几篇或长或短的文字，都不过若知堂先生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说的：“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一笑。”而且这些长短文字皆与我的职业、饭碗、职称、职衔全然无干，都不过一性情中人的放纵言语，要说这也叫“红学”，正是地地道道的“马二红学”。

作为一个专治马二红学的玩票客，随便讲点儿闲话、废话，既无所建树，也无伤大雅。虽说自以为较之知堂先生的“且谈草木鱼虫”多了一分人间烟火气，但在“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这一点上，还是大方向一致的。

②：《我的杂学》引言一文收入《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

目 录

自 序

困惑的红学

“红学”困惑的关联思考…………… (3)

也谈教训

——《还“红学”以学》读后杂感之一 …… (21)

也谈“红学”与“中华文化之学”

——《还“红学”以学》读后杂感之二 …… (28)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还“红学”以学》读后杂感之三 …… (35)

让曹雪芹也吐上几口血

——《还“红学”以学》读后杂感之四 …… (39)

也谈“崇实”

——《还“红学”以学》读后杂感之五 …… (44)

“红学”与人权 …………… (46)

模糊红学

曹家实录	(53)
谈“模糊红学”	(57)
漫谈红学考据	(72)
从红坛上的“卖”说起	(82)
缘红杂感	(86)
我为什么赞成“辽阳说”反对“丰润说”	(94)

华日祥云枕罩奇

——也谈恭王府与《红楼梦》

小引	(119)
恭王府沿革探源	(124)
《乾隆京城全图》可信吗?	(143)
进入府中看究竟	(160)
讹说种种之由来	(182)
花絮点点	(193)
后记	(203)

难得潇洒·····	(214)
旧事难忘,难忘啊 ·····	(219)

困
惑
的
红
学

“红学”困惑的关联思考

一、红学困惑

今春以来，国内几家报刊先后发表了《红学的困境》、《灾难的红学》、《“红学”之路怎么走》^①等多篇言简意赅的短文，纷纷指出：“近年来的‘红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会儿有人献出一张《红楼梦》八卦结构图，被某些‘红学家’叹为观止”，“一会儿又有人充满自信地破译‘红楼密电码’，被某些‘红学家’充满激情地‘赞同’和‘鼓励’，一

会儿又有人异常坚定地揭露《红楼梦》脂评大骗局”。因此著文者呼吁“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使长困于牛角尖和受人利用的‘红学’早日走出灾难。”这些短文刊出后，各地的文摘报刊纷纷转载。因而使人感到当前的“红学”确实已陷入困惑之中。

有道是“祸不单行”，一场困惑未化解，另一场困惑又降临，那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还“红学”以学》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就是《还“红学”以学》的最后一章，以黑体大字排印的那段结论性的文字中写下的：

还“红学”以学。

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区域。

为什么说这一段文字带来了又一场困惑呢？就在于这段文字给“红学”确立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新界说“红学就是中华文化之学”。此一新说与周先生数十年来一贯坚持的观点有了惊人的大转弯。如他在1980年写的《红学辨